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丛书

黄源深 主编

彭青龙 著

彼得·凯里 小说研究

A Critical
Study of
Peter Carey's
Fiction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丛书

黄源深 主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

A Critical Study of Peter Carey's Fiction

彼得·凯里 小说研究

彭青龙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彼得·凯里小说研究 / 彭青龙著. —上海: 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 2011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2251-6

I. ①彼… II. ①彭… III. ①凯里, P. —小说研究
IV. ①I61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4183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蔡一鸣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8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2251-6 / I · 0176

定 价: 42.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总 序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歧视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正式实施。在悉尼市政厅参加成立庆典的梁启超,忧心忡忡地预言:“在澳华人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果不其然,华人的境遇从此每况愈下。其实,受害的何止当地华人。这种旨在“保护”白人文明的文化壁垒,也殃及了中澳两国之间的交往。很长一段时期内,中澳文化交流处于迟滞状态。多少年之后,对垒政策终于被摒弃,中国的人文环境也渐趋宽松,澳大利亚文化才较快地在我国流布。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就是最好的见证。

从近代后期至今,澳大利亚文学在我国的译介可分为四个阶段:冷寂阶段(1901—1949)、解冻阶段(1950—1976)、热烈阶段(1977—2000)、深化阶段(2001至今)。每一个阶段的特征,都与两个国家在当时实行的治国方略和文化政策密切相关。

在1901—1949年期间的澳大利亚,“白澳政策”盛行,“文化奴婢主义”(cultural cringe)思想统治知识界,文化观照固执地定格于欧美,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亚洲文化采取冷漠、拒斥的态度。而在中国,推翻封建王朝与复辟帝制的博弈、军阀争夺地盘的混战、抗日救亡的生死搏斗、寻求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解放战争,占据了这一时期几乎全体国民的注意力,使之无暇顾及文化建设这类并不直接涉及民族存亡的事情。即便以此为已任的知识分子,因为深受半殖民教育的影响,目光也仅囿于美国和欧洲,很少想到那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于是,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冷寂也就势在必然了。这一时期除了寥寥无几的澳大利亚概况这类书籍,没有出现介绍澳大利亚文学的尝试。

1950—1976年,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起始时期。在澳大利亚,以惠特拉姆为首的工党于70年代执政,宣布取消“白澳政策”,中澳建立外交关系。以希尔为首的澳共“一枝独秀”,成为一盏政治明灯,拉近了中澳两国共产党的距离。在中国,无产阶级政权需要汲取外来文明,为我所用,而鲜明的政治动机又决定了单一的文化价值取向,这方面

在“文革”时期甚至走到了极端。这一时期的中澳国家关系和各自的治国大计,以及中国国内的政治气候等因素,决定了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传播的态势:冰凌开始融化,但速度十分缓慢。当时,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译介,态度十分谨慎,对书目都小心翼翼地严加选择,决定取舍的首要标准是政治倾向,艺术价值退居末位。因而最后和读者见面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基本上属于“无产阶级文学”,或者同情劳苦大众的创作,除了极少数,大多是政治上正确而艺术价值不太高的作品。此外,人们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所知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对此形成定见,当然也就谈不上研究了。

1977—2000年期间,澳大利亚继取消“白澳政策”之后,又积极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尊重各民族文化,主张文化互补,代替过去的“同化”政策。政治上开始意识到亚洲的重要性,目光逐渐东移,加强了同亚洲国家的交往。中国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改革开放,国门敞开,政治清明,文化包容。“文革”后选送首批赴澳留学生,学习澳大利亚文化,部分人专攻澳大利亚文学,回国后发起了“集团性”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译介出现了空前热烈的局面。许多大学纷纷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开设澳大利亚文学课程,招收澳大利亚文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召开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国际会议。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具有拓荒意义的澳大利亚文学史和选读等著作,有关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论文也频频出现在国内多家文学研究杂志上,有时这些杂志还开辟了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及研究专栏。一时间,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蔚为壮观,成为继美、英、俄、法等大国文学研究之后的又一大亮点。当然,文化积淀的过程十分漫长,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深入。

2001年至今,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步入了深化阶段。其外部原因是澳中关系不断改善,两国文化交往空前密切,一个重要标志是澳大利亚学者和作家频繁来华,或参加澳大利亚文学国际研讨会,或直接与读者见面介绍自己的作品,或成为大学驻校作家,讲授澳大利亚文学。其内部原因是多所大学积极开设澳大利亚文学博士课程,派遣多批学者,赴澳从事短期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培养出了一批专攻澳大利亚文学的年轻学者,成为当前我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中坚。他们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结合博士论文的撰写,对某一作家进行专题研究,利用学术交流的机会,赴澳作田野调查,采访研究对象,掌握第一手资料,运用现当代文学理论,对所研究的作家进行透辟的分析,写出较有深度的研究专著,从而把“散漫型”的研究导入“集中型”,使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向“深化”发展。

我们这套“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丛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诞生的。参与其事的大多为我的博士生,若干年前他们都已毕业获得博士学位,但并未被商品经济的浊浪所吞没而掉头他顾,而是潜心学问,继续深入研究相关作家,耗数年之精力,捧出了沉甸甸的专著,有力地印证了他们的艰辛付出。但回想起来,如果没有中澳两国关系的改善,没有澳大利亚国策的变更,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令人欣喜的局面,当然也不可能出现此类研究成果。所以这套丛书既是研究者各自劳动的结晶,也是整个时代的产物。

丛书所涉及的澳大利亚作家,大多为享誉澳洲文坛的大家,也是论家普遍关注的对象。他们的作品是不同时期澳大利亚文学流派生成与发展的风信鸡,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一定程度上也起着标杆作用。如怀特,他是澳大利亚迄今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善于挖掘“平凡背后的诗意”,有着前人所无法企及的深刻性。彼得·凯里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位两次获得布克奖中的一位(另一位是南非的库切,已于20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思想深邃,表现手段丰富,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之大成,而且每一部作品都富有新意,从而使他成为国内外各类文学奖项的胜出者和有力竞争者。托马斯·基尼利创作视野开阔,作品题材广泛,跨越时空,涉及古代、现代和当代、国内和异域,他的小说既具有严肃小说的深刻性,又不乏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因而同时受到学者和一般读者的青睐。其他作家也都各有特色,如乔利小说的复杂性和现代性、加纳作品的女权意识、卡斯特罗小说的后现代风格、威廉森戏剧的幽默和冷峻色彩等等,都是备受关注的澳大利亚文学现象,也值得我国研究者去探幽索微,发掘它们真正的艺术价值。

这套丛书的撰写者都是年轻人,主攻澳大利亚文学,具有相当的学术积淀和很强的研究能力,学术研究的前程无可限量。这使我们欣慰地看到,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中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前景是十分可喜的,让我们举起双手,欢迎这些“新人”研究成果的出世!

黄源深

2011年6月9日

于紫藤斋

前言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澳大利亚文学在世界文坛一直默默无闻,但众多作家都苦苦求索,希冀把本国文学推向世界。有的从作品本身着眼,追寻欧美时新的表现手法,以迎合域外读者的口味;有的离开故土,旅居海外,企盼在文化上得到欧美风雨的润泽,创作出为世界认同的作品;也有的在策略上苦用心计,作品写就便寄往英美出版商,先在国外打响,后转“内销”,以求在世界文坛谋得一席之地。但是,他们都未能如愿。平庸者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当时在国内堪称优秀者没有走进外国评论家的视野,更不用说在国际上形成影响。

1973 年,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帕特里克·怀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把澳大利亚文学推向世界舞台。怀特著有长篇小说十二部。他的作品多以澳大利亚的乡村和城市为背景,刻画无理想、无信仰的现代人的孤独、失落和苦闷,以及无望中几近徒劳的挣扎和探索。继怀特之后,彼得·凯里把澳大利亚文学提升到新的高度。作为两次布克奖的获得者和澳大利亚文化的代言人,他的小说充满着历史的张力。虽然作品中所描写的是一个陷入困境的小人物,但其身上都迸发着令人振奋的民族精神。一方面,他坚持回归本真性的历史责任感和仗义执言的道德操守,通过解读殖民历史档案和民族神话,重新塑造澳大利亚民族形象;另一方面,他凭借独到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勾勒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现代人生活画卷,不惜笔力对真、善、美进行讴歌与颂扬,对假、恶、丑进行鞭笞和讽刺。他描写的是本土的人物和事件,反映的却是世界性的问题;着眼的是澳大利亚的现实,关注的却是整个人类的命运。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也许正是彼得·凯里走向成功的“秘诀”。

本项目是对两获布克奖的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彼得·凯里小说的整体研究,通过解读当代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的小说,论述其文本中蕴含的民族意识、后殖民主义历史观、关注民生的人文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以及小说艺术的创新性,揭示其立足文化遗产、重塑民族形象

的艺术特质,为中国学者和作家提供借鉴。

本项目内容与方法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在国内首次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彼得·凯里近四十年的文学创作道路、思想和艺术特质。在国外,虽然文学评论界相继出版了五部彼得·凯里的评传性著作,但其系统性、连贯性、理论性和学理性都不够完善,尤其是在剖析彼得·凯里作品中所反映的民族劣根性方面,有的专著有闪烁其词之嫌,如卡伦·兰姆等^①。在国内,虽然也有学术刊物陆续发表了十多篇解读彼得·凯里单个作品的文章,但尚未出现以“立足文化遗产、重塑民族形象”为视角、整体性地研究彼得·凯里小说的学术专著。长期以来,中外学界似乎都认为彼得·凯里是一位历史小说的掘宝高手,善于借助历史人物和事件,来诠释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义。但鲜有学者以宏观的视野,将彼得·凯里的历史小说创作同民族文化身份联系起来,同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笔者认为,彼得·凯里的小说内容丰富、风格各异,但他的历史小说蕴含着强烈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观:重新审视被帝国歪曲的历史和文化。通过“写回”帝国中心——英美帝国,来探究澳大利亚民族曾经迷失的“根”和“文化身份”。“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历经岁月洗涤以后沉淀下的“根”,是一个时代风吹雨打后所保存的“前理解”,是一个社会走向未来的反思基点。^②处于帝国中心“边缘地带”的澳大利亚,对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依赖,使其历史记忆深深地打下了“臣属”的烙印。为了消除帝国的影响,彼得·凯里进行了有力的抗争,正是在这种帝国文本解构与建构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民族重新塑造文化身份的强烈愿望、历史负荷和现实困境。彼得·凯里没有告诉读者什么是澳大利亚的文化身份,但是其解构的过程正是文化身份建构的意义所在。因此彼得·凯里写回“民族叙事”、“帝国远征”、“殖民文学”、“历史记忆”和“文化霸权”等方面的过程就是建构澳大利亚文化新身份的过程,其实质是颠覆殖民主义话语,建立具有民族独立性的后殖民“反话语”模式。

① Lamb, Karen. *Peter Carey: The Genesis of Fame*. NSW: Angus & Robertson, 1992. Also see Windsor, Gerard. Rev. "Peter Carey's Old-fashioned Special Effects." *Bulletin* 23 Feb. 1988: 70; Pierce, Peter. Rev. "Generous Hope-filled Days." *Age* 20 Feb. 1988: 11.

②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23.

其二,对彼得·凯里的叙事艺术提出了创新性观点。笔者认为,彼得·凯里的小说并不适合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是多种形式的“杂糅”或者是兼而有之的“第三空间”。^① 他的小说世界色彩斑斓,艺术手法丰富多样。有评论家认为其作品与帝国经历交织在一起,因此他是一个后殖民作家。^② 也有评论家认为,他是一个后现代作家,因为他的作品符合詹姆逊所提出的标准——“高雅与大众并存、真实与表现解体、美学形式与消费行为共谋”。^③ 还有学者认为,他是科幻小说家,“点彩画般叙述与自我意识相容,噩梦、幻想和科幻混合,恐怖阴森的手法与大众化作品关联”。^④ 这些不同的“标签”一方面彰显出彼得·凯里叙述手法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评论界对其创作手法评价的分歧。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彼得·凯里从不局限于一种写作形式,而是在继承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不断超越,既有别于亨利·劳森的现实主义,也迥异于帕特里克·怀特的现代主义。在他的作品里,既有后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手法,如元叙事、戏仿、侵入式话语等,也有后殖民主义意义上的寓言和反讽。同时,他还运用现实主义的传统叙述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来凸显主题。可以说,彼得·凯里的小说是真实与虚构的结合,高雅与通俗的结合,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结合。这种非此非彼的艺术手法与澳大利亚非此非彼、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其三,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本项目在研究方法上博采众长,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吸纳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精神分析理论和叙述学等文论领域的最新成果,通过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宏观论述和微观分析相结

① “第三空间”概念源自霍米·巴巴的《文化的定位》,霍氏认为所有的文化形式总处于混杂性的过程之中,混杂性并不是追溯二元对立的两种本原,即东方/西方、文明/野蛮、白人/黑人、中心/边缘,而是让第三种在混杂中产出,从而使文化的生产性在第三空间得以生存和发展。这一概念为多元文化混杂提供了理论基础,是后殖民主义中重要的学术术语。此处借霍氏的概念指彼得·凯里小说叙事艺术的混杂性。详述见本成果第四章,第235页。

② Krassnitzer, Hermine. *Aspects of Narration in Peter Carey's Novels*. Leiston/Queen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5: 5.

③ Huggan, Graham. *Australian Writres: Peter Carey*.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④ Hassall, Anthony. *Dancing on Hot Macadam*. 3rd ed.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8: 5.

合的方法,从诸多细节入手,对彼得·凯里的小说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力求客观、准确地把握其小说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质。笔者认为,采用多元的批评方法是理解彼得·凯里小说的关键,因为:

“他的小说有一种复杂性。虽然他用词简单,句式也很短,看上去简单易懂,但读者很容易上当,止步于字面意义,而疏忽了底下潜藏的深刻含义。这种复杂性更体现在小说的内涵上,往往一个多少有点怪异的故事,几个差不多边缘化了的人物,以及看似让人始料未及的结局,却使整部小说意义含混,主题难以捉摸,作者的意图也扑朔迷离。同时,他善于运用逼真的细节,缜密地编织一个看似真实却实为荒诞的故事。因为细节的极度真实,使读者觉得故事很可信;但情节的发展又令人感到很荒唐。在真真假假的叙述中,作者将故事推向前进,就像布莱希特在戏剧中设置的‘间离效应’一样,彼得·凯里有意在人物和读者之间筑起了一堵墙,让阅读的过程始终保持理智的清明,随时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至于陷入强烈的情感所织成的罗网。”^①

此外,本项目以中国学者的眼光,客观公正地看待彼得·凯里小说中所涉及的土著文化和种族问题。有为数不少的澳大利亚学者,对彼得·凯里在小说中所体现的对土著人的同情不以为然,甚至加以激烈批评。^②笔者认为,历史是无法绕开的过去,土著文化是建构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建构当代澳大利亚文化身份的重要一极。就像澳大利亚人无法回避英国文化、美国文化和亚太文化的影响一样,土著文化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影响毋庸置疑,因为它关系到澳大利亚文化身份的起源和根基。彼得·凯里在小说创作中所彰显的正义和良知是值得称道的。

值得一提的是,本项目的衍生成果还包括一部二十余万字的译著《杰克·迈格尔斯》和一部四十余万字的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文学辞典:作家与作品》。前者是彼得·凯里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于2010年6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后者是国内首部澳大利亚文学辞典,于2011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① Peng, Qinglong, “Preface”. *Writing Back to the Empir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6: 2.

② 见本书第ii页脚注^①。

本项目成果的学术价值及社会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内容的开创性,是国内首部研究彼得·凯里小说的集大成者;第二,研究视角的独特性,首次以“立足文化遗产、重塑民族形象”为切入点,审视和论述彼得·凯里的文学创作思想;第三,研究方法的多元性,运用当下文论的最新成果,展开多样化的学术批评。

笔者迄今发表彼得·凯里小说研究相关论文九篇,其中六篇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国外文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等 CSSCI 来源期刊上,一篇发表在 AH&CI 期刊《外国文学研究》上,一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并被多家书刊、网站转载,一篇为译著《偷窃:一个爱情故事》(彼得·凯里著,张建平译)的前言。另有两篇论文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相关信息被报刊、网络报道,产生了相当的影响。2009 年第一期《外国文学评论》载文说:“中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也是起步于 80 年代初……进入 21 世纪以来,涌现出王腊宝、彭青龙等一批年轻学者,不仅出现了社科基金项目 and 硕、博士研究生,专著和论文数量亦有所增加,研究重点也向女性、华裔、土著等领域偏移,体现了澳大利亚文学的多元化特点。”

目 录

前 言

i

第一章	彼得·凯里:从新派小说家的代表到民族神话的制造者	1
第一节	文学创作初期:新派小说家的代表	4
第二节	文学创作中期:澳大利亚文化的代言人	11
第三节	文学创作巅峰期:民族神话的制造者	17
第二章	离奇世界折射现代人生——彼得·凯里短篇小说研究	29
第一节	帝国文化的囚徒	32
第二节	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	44
第三节	压抑而扭曲的欲望	55
第三章	立足文化遗产、重塑民族形象——彼得·凯里长篇小说研究	67
第一节	《幸福》中游离于地狱与天堂之间的澳大利亚人	70
第二节	“魔术师”的谎言与牢笼	85
第三节	《奥斯卡与露辛达》:承受历史之重的爱情故事	97
第四节	《税务检查官》:折翅的天使	113
第五节	《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边缘”向“中心”的呐喊	128
第六节	《杰克·迈格斯》:重写帝国文学经典	143
第七节	《“凯利帮”真史》:是“丛林强盗”还是“民族英雄”?	157
第八节	《我的生活如同虚构》:一部后现代理论小说	171

第九节	论《偷窃：一个爱情故事》中的艺术欺诈与人性 迷失	188
第四章	继承与超越：彼得·凯里小说叙事艺术研究	199
第一节	彼得·凯里短篇小说叙事艺术	202
第二节	彼得·凯里长篇小说叙事艺术	214
第五章	结论：重建文化身份	245
参考文献		259
后 记		275

第一章

彼得·凯里：从新派小说家的 代表到民族神话的制造者^①

^① 本章的部分内容已发表。见彭青龙：《当代外语研究》，2011，（2）：26-31。

彼得·凯里是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界的领军人物,是继民族主义文学奠基人亨利·劳森和现代主义文学巨匠帕特里克·怀特之后的又一位文学大师,被誉为“澳大利亚最有才华和最令人激动的作家之一”。^①迄今为止,他出版的十一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五部非小说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并屡获国内外文学大奖——两次布克奖,两次英联邦作家奖,三次迈尔克斯·富兰克林奖,他是世界上仅有的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南非作家库切,几年前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有评论家预言,凯里将是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竞争者。

凯里由默默无闻的广告设计商成长为蜚声国际文坛的著名作家,在世人眼中经历了从惊讶到怀疑、从认可到赞誉的创作历程。纵观他四十多年的文学创作道路,我们依据其文学成就和学界对作品的评价,将之分为三个阶段——文学创作初期:新派小说家的代表(1965-1979)、文学创作中期:澳大利亚文化的代言人^②(1980-1988)、文学创作巅峰时期:澳大利亚民族神话的创造者^③(1989-至今)。

① Hassall, Anthony. "Preface." *Dancing on Hot Macadam*. 3rd ed.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8.

② Turner, Graeme. "Nationalising the Author: The Celebrity of Peter Carey." *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 16. 2 (1993): 131-139.

③ Craven, Peter. "That Redeeming Black Magic." *Sydney Morning Herald* 9 August 2003; Spectrum 14-15.

第一节 文学创作初期:新派小说家的代表

凯里的文学创作是从长篇小说开始的,但却因短篇小说而一举成名,成为新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这与澳大利亚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他本人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

1943年5月7日,凯里出生于距离墨尔本市55公里的巴克斯马什镇,是父亲珀西瓦尔·凯里和母亲海伦·凯里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凯里的童年就是在这个乡间小镇度过的,父亲经营着P·S·凯里汽车销售公司,以推销通用汽车为生。1948年到1953年,凯里在巴克斯马什第二十八州立小学读书。十一岁时转学至当时澳大利亚最有名的私立学校——格朗语法寄宿学校。这所学校曾经培养出许多澳大利亚政界、商界的精英,同时也培养了许多敢于反叛文化艺术传统的艺术家,如影响巨大的作家杰弗里·达顿等。据凯里本人在1982年的回忆,就学于这所寄宿学校是其人生中充满戏剧性、令人痛苦而难忘的一步,当时学校弥漫着社会和文化剧烈转向的氛围。^①凯里把他在格朗语法寄宿学校的经历描绘成一个“腐烂的爱情故事”,并庆幸自己学业未完时就被“扫地出门”。^②然而,学校的报告显示出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凯里在校期间成绩优异,对前途“命运”充满无限的热情和信心,而不是他所描述的灰心丧气。^③

1961年,十八岁的凯里被坐落于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录取,学习有机化学和动物学。他对于科学的理解是理想化的而非理性的,他认为科学是“充满魔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现代炼丹术士都是原子科学家”。^④进入大学不久,他便遭遇了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影响了功课和考试,他

① Lamb, Karen. *Peter Carey: The Genesis of Fame*.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1992: 4.

② Nicklin, Lenore. "Peter Carey an Ad-Man." *Sydney Morning Herald* 13 Feb. 1975: 40.

③ Skatton, B. Housemaster's Report (Geelong Grammar), Dec. 1960, National Library.

④ Summers, Alison. "Candid Carey." *The National Time* 1 Nov. 1985: 32.